

先机与新局: 新中国初期重构 经济循环的新时代启示*

曹东勃 叶子辉

[摘要] 面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历史变局和经济困局,中国共产党以重构国民经济循环为标志的一系列经济治理探索与突围破局,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对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1949—1952年仅仅三年时间,中国共产党带领新中国完成了政治解放、经济恢复、社会进步、国家整合和外交突围,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开启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国民经济的再造,通过内外并举、重构经济循环的方式,顺利实现新中国发展格局的政治经济突围。充分借鉴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国家治理经验,我们要始终以决不妥协的信心维护人民利益,构建起与人民共命运的强大国家力量;始终坚持立足国内、自主发展,以内因调动外因,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发展;始终坚持准确识变、妥善应变,把握机遇,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新中国初期 经济循环 新发展格局

DOI:10.15894/j.cnki.cn11-3040/a.2021.05.014

新中国的建立拉开了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新征程的序幕。积28年革命斗争之经验,我们党从井冈山时期的武装割据到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社会管理,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区域治理模式。但在国家治理能力方面,党此前在偏远山区和广袤乡村所积累的经济治理经验遭遇了全面挑战。反动派扬言,共产党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上0分;投机资本家叫嚣,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①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在白皮书中断定,中国共产党解决不了人民的吃饭问题。^②然而实际上,中国共产党用了仅仅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在抗美援朝的复杂背景下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并在宏观经济运转、国际关系处理等

方面取得了可贵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被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1949—1952年,是中国共产党全面积累国家治理经验的开始,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以及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的背景下,重温先辈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面向‘00后’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BKS1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① 参见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371页。

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0页。

们筚路蓝缕艰难创业、奋力突围浴火新生的历史,从中汲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懈奋斗的智慧、勇气和力量,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一、破旧立新: 斩断旧有经济循环的束缚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经济是在传统的封建自然经济解体与帝国主义经济侵略过程中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旧中国的国内经济循环是建立在封建土地所有制上的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是缺乏扩大再生产的简单经济循环;旧中国的国际经济循环则是帝国主义依托各项特权完成对中国廉价原材料、劳动力的掠夺以及商品倾销市场的占有。在此被动格局下,旧有经济中有限的近现代产业主要被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国内外经济循环服务于旧势力与帝国主义的财富掠夺,而非实现本国人民利益的发展。

新中国的成立带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转折。要实现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推动中国自主的现代化进程,面对内忧外困的各种挑战,中国共产党必须作出破旧立新的历史决断。

(一) 百业凋敝: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出的经济苦果

“内无民主政治,外无国家主权”这是新中国成立前国家政治的真实写照。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政治上主权逐渐丧失,经济上被动卷入全球循环,逐步沦为帝国主义的原产地与商品倾销市场。进入20世纪,在经历了数十年内外部战争后,旧中国的经济基础,除少量帝国主义列强为加强对中国经济掠夺而客观上获得有限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外,更多呈现为封建农村的自然经济成分。一成工商业、九成农业的格局,在客观上造成了农村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口岸化买办资本经济的二元分离。^①有限的国内经济循环,却不自觉地扮演了帝国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殖民扩张的“马前卒”。

旧中国经济主权的丧失,源于政治主权的完整。攫取了大革命领导权的国民党并未真正为中华民族的主权独立而奋斗,反而走上背离人民意志、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为伍的独裁道路。政治上的独裁催生经济上的官僚垄断资本,

对外甘做帝国主义经济掠夺的买办,对内充当排挤民族资本发展的寡头,最终演变为阻挡中国经济发展的毒瘤。抗日战争期间,举全国之力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战时经济管制政策被国民党政权充当敛财工具,而抗日战争胜利后官僚资本通过对敌伪资产的接收和“劫收”,“集中了价值达一百万至二百万万美元的巨大财产,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②。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不愿放弃独裁统治,为维护独裁政权悍然发动内战,为筹措内战军费和削弱中共的实力,不惜出卖国家主权换取美国的军事援助。尤其是与美国签订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名义上是平等条约,实质上是单向全面“门户开放”,名义上是中国拥有全部主权,实质上不过是美国的新式经济殖民地,令中国完全沦为美国的政治经济附庸。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抢占市场,重创尚处于战后恢复的民族工商业,旧中国的实体经济逐渐走向凋敝;以美国面粉为主的农产品大量进口,落后的中国农业无力应对,大量农民破产沦为赤贫者。^③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经济的表象“繁荣”表现为以官僚、买办资本为主要获利者的进口商品倾销贸易,同期的出口贸易额仅为进口商品的1/5—1/3。在恶性通货膨胀加持下,国内城乡经济孱弱的有限循环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导致中国以农土特产为主要出口商品被动参与的国际经济难以维系。中国经济已经走向崩溃,这是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必然结果。只有彻底推翻致力于维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旧政权及其背后势力,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态。

(二) 金融风险: 新旧政权面临的共同问题

旧中国经济建设曾有过所谓的民国“黄金十年”(1927—1937年),但在根本政治制度和外部环境没有改观的前提下,这最终不过成了帝国主义资本扩张和转嫁危机的牺牲品。在白银大量外流的背景下,为化解流动性危机,1935年底,国民政府推行以外汇和少量金银作为准备金发行“法

^① 参见樊卫国《民国经济二元结构与农村分配》,载《上海经济研究》2003年第10期。

^②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53页。

^③ 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国经济发展史(1840—1949)》第1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3页。

币”的金融改革,在追求金融现代化的同时,却陷入了经济主权的“负外部性”深渊。抗日战争爆发后,军费支出急速攀升,为维持国家财政运转,国民党政权通过增发货币弥补财政支出,法币发行量从1937年抗日战争前夕的14亿增长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的5569亿。^①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忙于接收敌伪资产及扩张官僚资本,无视人民对和平与国家生产恢复的期盼,悍然发动内战,中国经济在遭受抗日战争折损的基础上再受打击。为维持国家财政运转,国民党政权通过增发货币弥补财政赤字。国民经济从抗日战争时的几近崩溃走向抗日战争胜利后财政赤字的持续高企,通货膨胀快速滑向恶性循环的深渊。在币制改革后至上海解放前,仅7个月时间物价指数上涨了1124.9倍。^②恶性通货膨胀令国统区经济进一步恶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实业停滞,在缺乏盈利空间的背景下,各类资本逐渐“脱实向虚”,国民经济陷入“资本空转”。

国统区的通货膨胀问题在解放区也有一定的呈现。1948年底,中国人民银行在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的基础上成立并开始发行人民币,逐步取代原各解放区流通货币。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解放区外线作战部队的军费全部转移至中央财政负担,但各地财政税赋并未统一于中央,这意味着中央只能以财政赤字承担起解放全国的军事任务。到新中国成立前,面对庞大的军费和人员费用支出,尚未统一财政于新政权的党中央只能凭借所掌握和调配的有限资源实施赤字财政。1949年全国财政收支中赤字比例高达46.56%,财政赤字主要依靠发行货币来弥补,直接后果是1949年底的人民币发行量为1948年底的160余倍。^③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社会发展惯性以及中国共产党为解放战争而延续的赤字财政两方面效应叠加,直接反映在社会消费品物价水平上。陈云在1949年8月的上海财经会议上直言“主要原因是财政赤字数目太大,钞票发行太多”,“物价上涨是因为追不上钞票的发行量”。^④

(三) 另起炉灶: 斩断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

基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本国情和社会性质,通过革命建立起来的新政权必须直面帝国主义。关于如何处理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中共

中央在1949年1月《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斩断一切与旧政权联系的方式以实现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的重新开始,即采取“另起炉灶”的方式处理相关问题。“另起炉灶”的对外政策选择“可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⑤,将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还给历史,用新中国开启新的国际格局。这是进一步否弃旧中国一切不平等条约,真正走独立自主发展的关键一步。

就当时的国际局势而言,在二战后初步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后者在当时高举反对帝国主义旗帜,对亚非拉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给予普遍支持,本身也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高度契合。基于此,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前已经确立了新政权的外交政策,即站在广大被压迫、待解放的弱小国家一边,也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政策的一套“组合拳”,旨在彻底清除外国在华侵略势力的遗毒影响,奠定一个坚实而独立的国家基础。这里的“一边倒”,指的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坚定地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这本质上是一条政治路线,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往来,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在对外交往中开辟新局,既要能稳定新中国政权独立自主的政治基础,也要有效维护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合法权益。

帝国主义国家因在华特权的丧失必然会针对新生的政权采取各种打压与围剿,其中对中国人

^① 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515页。

^② 参见张嘉璈《通胀螺旋——中国货币经济全面崩溃的十年: 1939—1949》,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424—425页。

^③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949—1952)》综合卷,中国城市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120页。

^④ 《陈云文集》第2卷第25—26页。

^⑤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2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页。

民利益影响最为严重的即是贸易封锁。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纠集已经败退东南一隅的国民党反动派,甚至亲自上阵,封锁中国的沿海港口;另一方面,串联帝国主义阵营,对新中国展开全方位的经济贸易封锁,试图将中国重新打回“闭关锁国”的自然经济状态。由此,旧中国畸形的、完全依靠原材料出口换取工业制成品而构建起的国际经济循环被彻底阻断。新政权面临着新的历史决断,只有开辟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的新形态,才能实现新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

二、调整转向: 稳定内政 基础上突破封锁

新中国成立后,以抗美援朝战争为首的三大运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立稳了根基并与社会主义阵营构建起政治互信基础,镇压反革命推动了社会稳定与生产正常化,土地改革则解放了农村生产力。^①在政治与社会稳定的背景下,面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种种经济问题,中国共产党仅用三年时间,通过内外并举、循环互动的方式实现了新中国发展的政治经济突围。

(一) 打赢经济领域“三大战役”: 以宏观调控稳定国内基础

民生为社会之本。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曾说,稳定物价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调整是调整工商业”,“只此两事,天下大定”。^②

首先,稳定物价以巩固新政权执政基础。物价问题是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根本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农村稳步推进土地改革,在城市则需要控制物价保障市民基本生活。陈云指出:“周期性的‘打摆子’,对军队,对广大人民,对国家货币基金,对我们的政治威信都不利,害处很大。”^③以往平抑物价更多依靠的是政治手段,然而,市场自有其规律在,政治手段可以在短期内干预物价波动,如无相应配套措施跟进,这种干预本身会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米棉之战”发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当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经生效,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允许市场自由交易,同时投机行为与正常工商业经营在大量货币超发的背景下难以有效界定,因此必须主要通

过经济而非政治的手段,在法律的框架内,以符合经济规律的方式,有效推进城市物价稳定。中国共产党发挥自身的优势,动员广大解放区农村筹集巨量的生活生产物资,以国家统筹调配的方式,采取市场化手段集中抛售,挫败市场投机势力,不但保障了市场供给,稳定了民生物资价格,同时完成了超发货币的回笼工作,从根源上解决了物价和恶性通货膨胀等遗留问题。“米棉之战”胜利结束后,物价虽有起伏,但总体已处于正常范围内。至此,我们党终结了自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后连续12年的恶性通货膨胀局面,稳定了长久执政的经济根基。

其次,统一财经以推动国民经济复苏。物价之所以上扬,货币超发是根本原因。这要求从政府财政政策入手,减少财政赤字规模,降低发行货币在财政支出中的比例。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尚未建立统一有效的财经工作制度前,中央承担的财政事权责任处于常态化的赤字状态,这既反映了此前战争背景下的收支不平衡问题,更多的则反映了“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并未理顺的制度性问题。财政事权是“中央—地方”权力责任划分的关键指标,新中国初期财政支出责任主要由中央承担,税收直接流向地方和基层,中央可支配收入不足,这是产生财政赤字和货币超发的直接原因。为转变“央—地”关系中财权事权不相匹配的情况,中央于1950年4月决定统一管理当年财政收支,将财政权集中至中央人民政府,同时通过公粮、税收奖励和附加公粮方式使地方保有适当财政事权。统一财经工作后,中央财政状况明显好转,1950年初计划发行的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最终因财政状况好转,仅发行第一期后即取消了原定第二期的发行。货币政策面临的外部压力也随之减释,市场物价受通货膨胀影响进一步降低。中央集中财政事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奠定了坚实的财政基础。

最后,调整工商业以促进生产生活改善。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受长期通货膨胀和战争的影响,国内工业几乎停滞,工商业资本抽逃转向投

^① 参见石仲泉《天翻地覆慨而慷: 中国共产党的100年》,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1年第2期。

^② 参见《陈云文集》第2卷第138页。

^③ 《陈云文集》第2卷第28页。

机领域的倾向较为严重。新政权为平抑物价采取的限制贷款、催收税款等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市场低迷、工商业产品滞销和生产困难,各类企业减少开工甚至无法开工的情况接连出现。化解这种全行业的生产停滞和经济危机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应对经济危机也在客观上为新中国重新理顺国内经济运行体系提供了重要机遇期。我们党开始有计划地根据国家战略需求和发展需要重构民族工业,推动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并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奠基。调整工商业主要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是理顺公私关系,促进民族工商业合理有序发展;第二步是通过财政刺激政策,帮助民族工商业渡过新中国初期应对恶性通胀等问题的政策调整期;第三步是对一些直接关系国家经济恢复的企业,采取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直接行政帮扶干预措施。1950年5月起系列政策出台,国民经济发展明显转好,即使抗美援朝开始,国内经济发展也并未受战争影响,反而因政府订货采购的增加呈现向好的态势。

(二) 打通城乡交流国内循环: 以“绕大圈”方式构建国内经济循环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便表现出高超的国家经济治理能力,实现了从战时恶性通货膨胀成功“软着陆”的奇迹。这背后是“摸到了转大圈子的办法,以百分之九十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带着百分之十的工业经济转动”^①。要改变旧中国经济循环被阻滞的局面,长远地看,首先就是要循序渐进,打通城乡交流,构建新的国内经济大循环。

其一,土地改革斩断传统羁绊,为城乡交流创造了全新条件。解放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农民被束缚在生产方式落后的土地上,农业经济的自循环系统与城市工业经济的交流十分有限。一方面,农民遭受各种盘剥,实际购买力低下,不具有对城市工业品真实消费的能力;另一方面,城乡经济交流主要依托工商业兼地主阶层的封闭通路,广大农民被隔离在循环之外。随着全国的解放,“军队打到哪里,贸易公司就跟到哪里。在市场上把投机商打倒了,树立了自己的领导地位,打开了局面”^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以革命的方式打破孱弱的城乡经济通路,通过建立贸易公司等方式,在农村地区收购粮农土产,

保障城市生活生产物资供应,完成了人民币下乡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即用人民币换取农产品,将剩余劳动从农村转移出来。农民的重积累习惯致使农村对城市工业品需求不高,最终结果就是新发人民币超过四成沉淀在农村^③,为新中国稳定物价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国营贸易公司能够在农村地区敞开收购余粮,其关键在于土地改革圆满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目标,打倒了压在人民头上盘剥的旧有统治阶级,减轻了人民的实际税赋承担。农民收益的货币化提升了中国广大基层农村人口的购买力和消费剩余,为工业品下乡和农业生产资料革新作了铺垫。由此可见,农村地区土地改革是打通新中国城乡经济大循环的起始。

其二,合作经济蓬勃发展,打通了城乡经济交流的“最后一公里”。受制于经贸干部数量,新中国初期国营贸易公司的覆盖面明显不足,粮食筹措收购主要依靠各基层组织和土地改革工作队的支持配合,城乡经济交流的制度成本高企。这要求在农村基层构建起高效且成本低廉的经济交流系统,填补国营贸易公司与农户之间的贸易通路空白,服务城乡经济交流。为推进农村经贸工作,国家提出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组织生产的、消费的和信用的合作社,和中央、省、市、县、区的合作社的领导机关”^④。《共同纲领》将这种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以“临时宪法”予以确定,并在后续实践中逐步建立规范的体制机制,为合作社经济发展奠定了法律与制度保障。在城乡经济交流工作中,供销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发挥巨大作用。供销合作社一方面承担各类粮农土产的收购任务,另一方面将各类工业品输送到乡村地区,作为国营贸易公司在基层的中介代理人,完成了打通城乡经济“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任务。在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供销合作社,整合农村各方面经济力量,成为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组织农村商品流通的主渠道,是联结城乡、联系工农、沟通政府与农民的桥梁和纽带,实现了与城市国营贸易公司的对接。同时,具有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

① 《陈云文集》第2卷第202页。

② 《陈云文集》第2卷第222页。

③ 参见董筱丹、温铁军《去依附: 中国化解第一次经济危机的真实经验(1949—1952)》,东方出版社2019年版第15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32页。

作社经济也为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新路径。

其三 推动工业品下乡反哺农业,是完成城乡经济交流闭环和国内经济大循环的关键一步。也应看到,货币沉淀在乡村加剧了原有城乡经济各自循环的状态,同时外部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加重了工商业原有口岸对外经济循环模式的困境。而农民因土地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具有相当的购买能力,因此,破除经济危机的“主要希望还是寄托在农民身上”^①。为有效盘活城市工商业,推进沉淀农村的货币回笼,政府在城市,引导工业发展适应服务农业农村农民的需求,“采取加工订货、代销等方式推销,帮助城市工业发展”^②,最终发展为“统购统销”的半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农村,依托国营贸易公司和代理店推销工业品,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供销合作社,推动工业品下乡。工业品下乡,特别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各种产品下乡,改善了农村地区落后生产力的现状,有效提高了农业经济产出,为此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村的合作化、集体化道路夯实了基础。农村吸收了相当数量的工业品用于生产资料的改善与更新换代,直接推动了新中国农业生产的快速恢复与发展,连续实现年产值大幅增长,至1952年主要粮农产品均达到或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为新中国的工业化稳定了最重要的经济基础。^③对工商业来说,工业品下乡完成了资本的“惊险一跳”,通过国内经济“绕大圈”实现了内循环的重塑,农村消费市场的打开,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持续推动国家经济稳步发展。

(三) 开辟社会主义阵营新渠道: 构建国际贸易新循环

新中国成立后,帝国主义集团在政治上围堵,军事上恫吓,经济上封锁。这也倒逼新中国在外贸方向上打通社会主义阵营贸易通路,顺利突破西方封锁,开辟国际经贸新循环的新局面。

其一,西方经济封锁迫使新中国调整外贸结构和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基础薄弱,工业产值低,重工业近乎“白手起家”,主要工业品依赖进口,出口贸易产品主要是以原材料为主的土特产。两大阵营分野的日渐清晰必定导致贸易上的政策区隔,因而必须充分利用短暂的政策间隙,在海外大量从速采购国内亟须的重要物资,以助力国内经济建设和尽快走出战争阴影。1950年

上半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的封锁,我国在外贸领域开展了物资抢购、抢运工作。特别是,中央充分重视香港在外贸、外交和统战工作中的作用,利用英美矛盾不断突破封锁禁运,维持贸易往来。^④外部的封锁对新中国刚刚起步的经济必然产生沉重打击。为此,中央与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分别签订政府间贸易协定,推动我国国际贸易大幅转向社会主义阵营,参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国际贸易。与此同时,社会主义阵营在中国入朝参战后也在工业化建设和技术援助等方面给予我国大量主动支持和帮助。我国迅速调整对外贸易结构,一方面,对进口商品进行管制,以生产资料和我国不能生产的必须消费品为主;另一方面,积极拓展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贸易通路,推销我国农土特产,进口必要的国家建设生产资料。相较于民国时期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二八开”的贸易结构,新中国进口商品中超过八成是生产资料,生活消费资料的进口不足两成,进口贸易结构的调整充分展现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的愿望和要求。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贸易过程中,带有帮扶援助性质的贸易同时也帮助国内的农土特产打开销路,至1952年“中国与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大陆对外贸易总额的81.3%”^⑤。

其二,橡胶贸易成为由单向帮扶转向贸易互助的突破口。在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经济交流中,橡胶即是典型一例。随着冷战开始,苏联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封锁,尤其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够自产的工业原材料,其中最突出的是橡胶问题。对橡胶贸易问题,中苏高层领导人在1949年底已有过交流,受国内相关产业发展限制并未深入。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橡胶进口路径被完全切断,严重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国民经

① 《陈云文集》第2卷第122页。

② 《陈云文集》第2卷第225页。

③ 参见吴承明、董志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52)》,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398页。

④ 参见聂励《新中国成立初期香港贸易危机与中英关系》,载《中共党史研究》2021年第2期。

⑤ 武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上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第175页。

济。仅就地缘关系和传统贸易通道来看,新中国与东南亚、南亚橡胶生产国始终保持着贸易往来通路,南洋地区广大华侨也为中国购买橡胶拓宽了路径。在这种高压态势下,中苏两国高层仅在1949—1952年间就围绕橡胶贸易问题先后进行了九次电报往来。^① 橡胶贸易是苏联方面第一次因贸易问题而主动邀约中国。由中国代订货的方式可以暂时解决社会主义阵营橡胶短缺的问题,但要想更为彻底地解决橡胶危机,必须实现自主生产,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控制。中苏双方在橡胶问题上展开了进一步的商议,最终签署《中苏关于橡胶技术合作的协定》,以约定两国在橡胶问题上的权益问题。橡胶问题为中苏贸易打开了新的窗口,由原先中国单方面依赖转变为双方贸易互助的新形态。橡胶贸易是新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经贸关系发生转折的重要标志,立足于独立自主和国际主义的原则,中国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贸易往来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合作共赢效果。

其三,在冷战双方的阵营缝隙中开拓贸易通路。一方面,新中国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国际贸易往来中,逐渐地促成了在货币结算、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方面的密切合作,在国际贸易舞台上寻求不断扩大自身利益最大化发展的策略。另一方面,新中国努力在帝国主义的封锁中穿插迂回、绝地反击,积极利用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展开贸易工作。二战后各国百废待兴,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并不符合诸多国家的经济利益。利用好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内部矛盾,洞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帝国主义粗暴的贸易霸权中寻找双方共赢的贸易通路,找准西方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狂人”和“投机商人”两种矛盾性角色设定之间的缝隙分而治之,成为决胜的关键。例如,中国与锡兰的大米换橡胶的贸易,就充分利用了对方需求以实现我方战略目标。再如,中国借助“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等机会,充分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界、学术界展开交流,开拓贸易通路,让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重新认识新中国在国际贸易舞台上的姿态与政策,促成了诸多协议的达成。尽管与资本主义国家签订的多项协定最终未能履约,但为抗美援朝后中国国际贸易的进一步拓展作了良好铺垫。

总之,在尖锐的“反封锁、反禁运”斗争中,新中国逐渐掌握了世界贸易规则,积累了一定的国

际贸易经验,培养了一批谙熟国际贸易的人才,为新中国后续国际贸易发展探索了道路。

三、时代回响: 国家经济治理的新时代启示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②,1949—1952年是新中国史的最初三年,更是中国共产党全面积累国家治理经验的奠基阶段。我们党在国民经济恢复中,破除了旧有经济循环,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重新构建了新中国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循环的新模式,为随后创造性开展社会主义改造和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初期的经济治理经验是进入全面执政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所作的艰辛探索和创新突破,是在历史变局中沉着应对与寻机突破的教科书式经典操作。新中国初期重构经济循环的国家治理经验,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并审视其内在合理价值,“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③。当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更需要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在内外多重压力之下大胆破局、再谋新局,求得新时代治国理政的最优解决方案。

(一) 以决不妥协的意志维护人民利益,构建起与人民共命运的强大国家力量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无论身处何种境遇,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从未动摇。在新中国初期经济治理的各项政策措施中,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的旗帜、站稳人民的立场,在国家主权等核心利益上坚决不让步、不妥协,坚定地维护了人民的利益,因此才能够发动人民,将国民经济恢复工作同时转化为一场深入动员人民、塑造人民国家意识的精神洗礼与政治教育。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目

^① 参见沈志华《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1945—1991)》第4卷,东方出版中心2015年版第45—47页。

^②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7期。

^③ 同上。

的是掠夺财富、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等问题并不在其视野之内;新中国的财经政策则围绕着捍卫人民利益而展开,一系列举措从根源上稳固民生、保障民财、赢得民心,树立了新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威信。

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面临形形色色的困难,无论是逆全球化的浪潮,还是中美贸易战的阻拦,中国的发展必须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价值诉求,才能在时代的发展中交出满意的历史答卷。坚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需要持之以恒增强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本领。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面临的经济局面对中国共产党而言,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也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我们党靠的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理想信念,靠的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担当作为,硬是从重重困难中拼搏出中国经济恢复的国内国际新循环形态。“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深厚基础和最大底气……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①,“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人民立场、人民至上,就一定能够激发出无往而不胜的强大力量,就一定能够不断书写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精彩华章”^②。人民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根基,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国家发展核心利益不动摇,始终站在人民立场,构建起与人民共命运的强大国家力量,就能有效引领人民创造民族复兴新征程的伟大奇迹。

(二) 始终坚持立足国内、自主发展,以内因引领外因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战略纵深的大国。正因其大,才能够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区域间产业分工、协作、转移的梯度和秩序;也正因其大,才能够支撑得起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之所以同时在恢复国民经济和抗美援朝两条战线上获得胜利,关键正是在于充分发挥了大国优势。通过土地改革、平抑物价、统一财经、调整工商业、三反五反等种种举措,新中国用革命的方式斩断了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展的阻碍,实现了国家独立自主的发展,通过国内经济整顿实现了经济的去依附,迈出了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一步。

在贸易保护主义浪潮甚嚣尘上、逆全球化声

音不绝于耳的当下,“传统国际循环明显弱化……必须把发展立足点放在国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实现经济发展”^③。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正是“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练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④,这与新中国初期以“绕大圈”促进城乡交流作为激活国内经济循环之主线的政策思想不谋而合。今天的中国较之70年前拥有更加有利的国际地位和更加强劲的国家实力,完全有能力打通国内经济循环通路,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最大限度开发经济发展潜力。“推动国内大循环,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⑤,要通过国家有意识的逆周期调节引导经济更多依靠科技创新的高质量发展道路,通过强大生产能力支撑国内巨大市场需求,通过国内巨大市场体量反哺生产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总之,国内大循环的进一步畅通与深化以及与国际大循环的良性互动,引导了国内生产力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供给,为国内经济构建了适度的减震带、缓冲区,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国际经济波动对国内经济的冲击,切实提升了人民生活水平。

(三) 始终坚持准确识变、妥善应变,把握机遇不断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

新中国的成立深刻改写了世界现代史,对东亚国际政治格局更是产生了颠覆性影响。中国抗美援朝完全打破了帝国主义在东亚建立“新殖民”政治体系的意图。彼时彼刻与此时此刻,中国无

①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10月24日。

③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载《人民日报》2020年11月4日。

④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

⑤ 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

疑都身处百年变局的历史漩涡中。中国革命胜利的密钥之一,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不同的历史变局中永立潮头,始终驾驭风险挑战。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发生的诸多变革以及中央应对这些变局所作的一系列政策调整和转向,显示了高瞻远瞩的战略勇气和政治智慧。

当前,党中央作出了“虽然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并进一步释义为“机遇和挑战之大都前所未有,总体上机遇大于挑战”的重要战略判断。^①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新发展阶段,面对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更加需要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实现高质量发展,更加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扭住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立足“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朝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方向迈出关键步伐。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保障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不被打断,如何更大力度凝心聚力、排除一切外部干扰,是现阶段对中国共产党政治智慧的最大考验。与此同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蕴藏着国家跨越式发展的新机遇。危机中育先机,变局中开新局,“时与势在我们一边,这是我们定力和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决心和信心所在”^②。稳定内部局势后的外部突围更加需要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在新时代的国际政治斗争中,更加需要咬定青山、保持定力,破旧局开新局,一步一个脚印朝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进。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③1949—1952年,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构建国民经济循环开篇布局的关键三年。所谓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是从连年战争之后的国民经济崩溃和一盘散沙中恢复,从恶性通货膨胀中恢复,从一边抗美援朝保卫祖国、一边制定规划建设祖国

中恢复。2019—2022年,我们面对的是又一个恢复期——从贸易冲突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恢复。今天的中国是屹立于世界东方的第二大经济体,是建成了独立、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大国,是与世界上180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的大国,是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率先复苏并展现出巨大制度优势的大国。中国发生“换了人间”、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但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一如既往,中国共产党人不怕困难、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和魄力一以贯之。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叶子辉: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杭州医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潇锐)

^① 《深入学习坚决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确保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载《人民日报》2021年1月12日。

^② 习近平《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载《求是》2021年第9期。

^③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